

热风学术

# 热风学术 | 第三辑

## REFENGXUESHU

主编 王晓明 蔡翔  
执行主编 雷启立

上海人民出版社

热风学术

# 热风学术 | 第三辑

## REFENGXUESHU

主编 王晓明 蔡翔  
执行主编 雷启立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热风学术.第3辑/王晓明,蔡翔主编. —上海:上海  
人民出版社,2009

ISBN 978-7-208-08815-3

I. 热… II. ①王…②蔡…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157745 号

责任编辑 朱慧君 贾延祥  
封面装帧 北戈工作室

热风学术

第三辑

主 编 王晓明 蔡 翔

执行主编 雷启立

世 纪 出 版 集 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0.5 插页 4 字数 314,000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8815-3/G·1315

定价 35.00 元

## 目 录

### 阅读当下

- 农村老年人为什么选择自杀 贺雪峰  
——湖北京山农村调查所感/3
- 从婆媳关系变化看社会和家庭结构的变迁/12 杨 华
- 夫妻关系与家庭结构的变化 刘燕舞  
——基于湖北省鄂县鄂村离婚现象的研究/23
- 基督教在沙村的传播/34 郭俊霞
- 梭村农民的宗教信仰/51 宋丽娜
- 面子竞争与农民的意义世界 袁 松  
——从村庄的流动性切入/61
- “农民”身份与乡村文化/72 李 阳

### 再解读

- 1949 年以后的沈从文/83 钱理群

### 文学内外

- “伦理与道德困境”的历史突围 王琦涛  
——解开《色·戒》中性政治与国族认同的纠葛/127
- “我们”和《WM(我们)》/149 吕永林

### 重返现场

- 民主在延安/167 朱鸿召

## 边缘记忆

从集体生产到分田单干/199

余师傅的文艺生活(1976—1980)/207

回城故事/219

“差半步”/228

她的 1976—1980/235

转折年代的日常生活/247

吴方贵 吴子枫

余华平 余亮

孙葳 李宝琛

于立平 乔焕江

夏一玮

张屏瑾

## 热风·论坛

金融海啸与我们的未来/255

许宝强

## 翻译·理论

刨出金融危机的祸根

肖娟

——韦德教授和他的研究/265

全球视野下的第一世界债务危机 2007—2010/270

罗伯特·韦德 肖娟 译

金融体制的变更? /289

罗伯特·韦德 肖娟 译

新的全球金融体系? /303

罗伯特·韦德 肖娟 译

编后记/319



本辑收录的这7篇文字,基本都出自2008年秋天在湖北京山县的一次调查。30多位武汉和上海的年轻学人,在贺雪峰先生指导下,以两周时间,在10个村子,同时调查乡村的文化状况。我没能和他们一起住进村子里,但赶上了他们结束调查、返回武汉、在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中心举行的总结会。将近20位年轻人,报告了整整一天,密集的内容,充满细节的讨论,我很快就仿佛置身于乡村现场。从上海去的那些年轻人,平常大都是谈文学、谈理论,这时候却和武汉的同伴们一起,谈乡村的婚风丧俗、农人的孝道亲情、农家院子里的电视机、老人口中的基督教……那种思绪被激发的活跃的神情,令我印象深刻。

今天的中国,当然是被城市主导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真可以放肆地牺牲乡村。如果农民的日子过不好,任何别的中国人,都不可能有长久的好日子。这10年间,“三农”愈益成为一个流行词,就说明朝野上下已经对这一点有了共识。但是,究竟怎么理解“三农”问题?除了从经济和政治的角度看,是否也要从文化的角度看?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说:如果光有前者,缺了后者,我们其实是看不清的,因为就在“三农”的那些仿佛只关乎经济和政治的痼疾内部,分明布有深巨的文化溃烂?我们是否还可以进一步说:如同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今日中国的都市和乡村,也早已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再难分开来看了。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贺雪峰先生及其同道的努力,显得特别重要。我们所以编发这一组文字,就是想凸显这个意义,激发进一步的讨论。(王晓明)

# 农村老年人为什么选择自杀

——湖北京山农村调查所感

贺雪峰\*

中国是一个缺乏超越性信仰的国家,家庭成为中国人的宗教。最近几十年,随着现代性向农村的全方位渗透和农民的大规模流动,农村出现了从治理结构到个人价值的巨大变迁,农村家庭也开始出现深刻变化。农村老年人是社会和家庭中的弱势群体,在某些地区出现了严重的老年人自杀。为什么会出现严重的老年人自杀,及老年人高自杀率会引发何种严重后果?本文以湖北京山调查为例作些讨论。

2008年国庆节期间到京山县孙桥镇S村作为期半个月的调查,发现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之严重,已经到了难以想象的程度。我们调查的S村三组,总共只有30多户,最近20年却有10多例老年人的自杀。调查期间,全村有3例老年人死亡,全为自杀。问村里的老年人,最近他们所在村民组有无老年人非正常死亡,有两个老年人的回答是,他们村民组最近这些年就没有老年人是正常死亡的。老年人的非正常死亡就是自杀,略有

\* 贺雪峰,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主要著作有《新乡土中国》、《乡村治理的社会基础》、《乡村的前途》、《中国村治模式:若干案例研究》等。

不同的是,有的老年人是因为得了重病而自杀,还有的老年人则是因子女不孝而自杀。因为自杀问题比较敏感,我们也不方便老是追问。从所获资料估计,有些村民组可能有一半的老年人是自杀死亡的,全村老年人自杀率也是高得惊人。不仅是S村老年人自杀率高,而且本次调查组所调查的另外9个村的老年人自杀率也都很高。S村三组徐姓老人,今年60岁,身体健康,是全村公认豁达健谈的老人,说话幽默,记忆力又好。他说自己20年前认为上吊自杀的人都是傻子,而现在则认为他们都是明白人,明智人,因为有病无钱医。人老了,吃不起这个亏,受不起这个罪。人总有一死,不如一死。他又说,我认为自杀是自愿,病痛折磨,又要劳动,关键是没有意义,那还活着干什么?

## 二

任何一个健全的文明都会发展出一套针对死亡的文化来,因为任何社会及任何个人最终都要面对死亡。正是一个健全而健康的文化,可以让这个文化的成员泰然面对死亡。中国传统也有这样的应对死亡的文化。但是,俗话说,好死不如赖活着,何况京山农村当前的经济发展水平已是远高于温饱,农村老年人很少是吃不饱饭的。即使生病,也并非不可救药。京山老年人为什么这么轻易地选择自杀呢?

要理解京山农村老年人的自杀,首先要理清京山老年人自杀所引起的后果。问题是,京山老年人自杀往往引不起任何后果。有老人用调侃的语气说,老年人死了还不如一条狗。这话虽然有点过,却很说明京山老年人自杀所引发后果的实际情况。我们查看历年来S村老年人死亡的登记,除个别例外,几乎所有老年人死亡都登记为正常死亡,而据我们调查,其中大约1/3的老年人是自杀,或上吊,或服毒,而不是正常死亡。在S村,若老年人因病自杀,则这样的自杀是算不上自杀的。村民认为的自杀,一般指身体健康但子女不孝、生活无着所导致的自杀。即使子女不孝导致老年人自杀,也不大会造成严重后果。首先是,从来不会发生老年人(如果是女性的话)娘家人过来讨说法的事情,从来没有发生过——至少我们调查的S村是从来没有发生过的。其次是村民并不会因为老年人自杀而谴责他的子女:那是别人的家事,其他村民似乎没有理由会干涉别人的家事。甚

至,村民中往往会流传对自杀老年人不利的舆论,比如说,她之所以自杀,是因为她太好强了,太多言了,太喜欢在外人面前说自己媳妇的坏话了,而全然不顾这个自杀老太太说的是否事实,及是否在理。老年人自杀了,但在村里引不起反响,没有涟漪,很多人都不知道也不去问为什么而死。老年人自杀后,子女似乎也很少有内疚感,更不用说负罪感。老年人自杀后,他们的子女按一般程序来操办丧事,完成任务,然后再正常地过自己生活,似乎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也什么都没有改变。

老年人自杀,采取的也往往是没有任何反抗性的自杀,自杀的目的不是为了报复子女,不是为了达到某种个人死亡以外的目的,自杀就是为了解脱自己,就是认为自己活着没有意思,老了,病了,没有用了,该死了。老年人往往是悄悄、平静地自杀。参加调查的上海大学的李晨说,老年人没有任何反抗的自杀最可怕,因为一点震撼性的力量都没有。是的,京山老年人的自杀并不表达他们反抗什么,他们已经心死。他们并不是要反抗,所以他们静悄悄地自杀。在村庄中,老年人自杀已经不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事件,甚至不再是一个值得谈论的话题。

### 三

为什么京山农村老年人会如此普遍及如此没有反抗地自杀?

首先,这与京山农村老年人所处的结构位置有关,他们在目前的结构中几乎没有地位。在S村调查期间,我们入住的房东家,房东姐姐正好过来住几天。再过几天,我们即知道房东姐姐竟是被自己媳妇赶出来的,被赶出来的原因是她多话。前不久,她将自己与丈夫多年积攒的2万元钱拿给儿子和媳妇,给钱儿子和媳妇,媳妇本来是高兴的。不过,她自己有点忘形,对邻居说了给媳妇2万元积蓄的事情,媳妇知道很恼火,呵斥她说“2万块钱在现在算个屁啊,有本事将来不能动了,不要我们养”,因此将婆婆赶出门。房东的姐姐万般无奈,只有到弟弟家住几天,避避风头。

房东是当地很有名望与影响的人,他有6个姊妹,其中来他家住的是大姐,今年刚好60岁,另外还有两个弟弟和两个妹妹,且他的姐姐和两个妹妹都嫁在本村,两个弟弟也在本村。去年,

大姐的丈夫得病去世。现在,大姐将积攒多年的2万元钱交给媳妇,却被媳妇赶出家门。房东大姐只有这一个儿子,儿子所娶媳妇,不仅是本村的,而且是本组的。在这样亲密、这样熟悉的关系中,房东的大姐竟被赶出家门,无处可去。

如果房东的大姐是被其他人赶得走投无路,我相信,包括房东在内的他们六姊妹,是有力量为大姐讨回公道的。问题是,大姐是被自己媳妇赶出家门的,清官难断家务事。房东也曾到大姐的媳妇家说好话,但媳妇仍在气头上,不肯原谅,大姐也只得再在几个弟妹家里轮流住,等着她媳妇消气。

房东之所以对自己姐姐被媳妇赶出门的事情忍气吞声,是因为他认为,自己不应该管别人的家事。姐姐是自己的亲姐姐,但姐姐的儿子也是亲儿子。母子关系之亲,恐怕是亲于姐弟关系的。对于更为亲密的母子关系,姐弟关系似乎是说不上话,讲不成狠的。讲狠之后自己也不可能养姐姐一辈子。

更重要的是,京山农村存在着一种对老年人十分不利的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似乎认为,人老了就不值钱了,欺老不欺少,因为老年人总是要去世的,而未来是年轻人的。徐姓老人说,老年人身体好,可以为子女做点事情时,他们就接纳你,你若老病,他就会抛弃你。他说这个情况,恐怕全国都一样,再大的官来这里也解决不了问题。他自嘲地引用五句话来形容老年人的处境:生个儿子喜一跳,收个媳妇打个灶(分家),分家分到鸡子叫,两个老的没人要,一头母猪还走俏。他说前四句全国通用,后一句则是村里的一个真实故事。

在京山调查发现,凡是老年人能动,就一定要劳动。人们似乎认为,老年人不应该有什么特别的享受,手上不应该有钱,一切应该为子女好,一切围绕子女来。甚至老年人治病,也要比较治病花费与老年人治好病后可以创造收益,若治好病后可以创造更大收益,这个病就值得去治。这种计算方法,不独是子女,而且老年人自己也是如此计算,这种计算是一种地方性的共识。如果有老人不这样计算,那就是不懂得做老人,不知道珍惜自己的子女。

也就是说,在京山农村,已经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地方性规范,一种对老年人十分不利的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强调,老年父母不应该对子女抱有太多期待,应该多从子女的角度考虑问题,不能在自己病痛时拖累子女,不应该在超出子女经济能力

情况下治病,不应花费除了必需生活品以外的闲钱,不应参加多余的娱乐,能劳动则要天天劳动以减轻子女负担。总之是父母虽然生养了子女,却似乎没有理所当然要求子女养老的义务,没有子女应该将老年人供养起来的义务。若有子女特别孝顺,甚至在超出自己经济能力的条件下改善老年人的处境,则村庄舆论一方面会评价子女很孝顺,是正面评价,一方面又说父母不会做人,不懂得怜惜自己子女,是负面评价。用京山一位老人的话来说:人老了,想过得舒服一点,是不可能的事。

问题是,京山农村,为什么不仅会出现对老年人十分不利的舆论,而且老年人还会接受这种对自己不利的舆论。

#### 四

陈柏峰、欧阳静等人调查京山G村的一个老年妇女,这个老人对媳妇很不满。欧阳静问她相不相信鬼神,她说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什么鬼神啊!要是鬼,我死了就变成厉鬼,将媳妇搞死。正是这个说死后若能变成鬼,就将媳妇搞死的老人,过了几天就服毒自杀。她当然是不信鬼的,就是能变成鬼,她也未必会将媳妇搞死。说要将媳妇搞死,只是她心中有对媳妇的不满,但还不是仇恨——这里的舆论或观念是不允许父母对子女有仇恨。若她真的有这种仇恨的,她大可不必等死后变厉鬼来将媳妇搞死,而可以先毒死媳妇,再自己喝农药——在河南安阳调查,我们就碰到这样的例子。

在京山农村,我们问农民信什么,他们的标准答案是既不信鬼,又不信神,唯一信的是科学。他们说,这个世界上哪里有什么鬼和神啊,谁见过?因为缺少对鬼神世界的想象,缺少对死后世界的想象,人们有了病痛,有了委屈,有了心酸,他们就觉得这个世界没有值得留恋的,没有意思。何苦忍受煎熬,一死百了。

因为只信科学,不信鬼神,老年人就缺少对死后世界的想象,就不必考虑下地狱或上天堂,就不担心成为野鬼或孤魂,就缺乏了对生命的基本敬畏。因此,他们在选择自杀与否时,就显得自然、从容甚至冷酷。有老年人说,人总是要死的,这是自然规律,是新陈代谢。这种唯物主义的态度,使京山农村老年人可以坦然接受死亡,也可以坦然接受火化。

既然京山农村老年人不信鬼又不信神,缺少对死后世界的

想象,他们是否自杀,就只取决对现实的权衡,而其中最重要的考虑是在对自己不利的意识形态下进行的。老年人自杀逻辑大致如下:

当自己能劳动时,老年人会辛勤劳动,以为子女提供更好一些的条件,至少要减轻子女负担。如杨华所说,在京山农村,若老年人不能为子女做事情,他们就会有亏欠感,就觉得自己该死。一旦老年人生病,即使子女要给自己治病,老年人也会觉得不应该浪费子女钱财,否则,万一治病花了钱,病又没有治好,或病虽治好了,自己却未能为子女再创造更多收益,这样就会“人财两空”,就对不起子女。这时候,比较应该的选择就是自杀,而非赖活着。

同样,老年人即使没有生病,但已经丧失劳动能力,不能为子女做事情,他也可能选择自杀。

这样,在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除子女不孝引起的利己型自杀以外,老年人自杀的主导方向是利他型自杀。他们自杀是利他的(利子女),同时,他们的唯物主义态度,他们对于自己已经完成人生任务,对一死百了的计算,等等,也促使京山农村老年人容易选择自杀。

## 五

京山农村老年人自杀,与全国其他地方有若干差别。以下我们选江西、四川、福建、河南、湖南几个地区来作点比较:

吕德文是闽西客家人,他父亲在49岁时就向家人宣布退休,从此不再参加家里的主要农业劳动,最多只做些辅助性的工作。在吕德文的父亲看来,自己生养了子女,子女都已经成人,自己也该享福了。吕德文父亲宣布退休的做法未必就是闽西客家农村的常规,但至少可以说明,在闽西的客家地区,老年人可以心安理得地退休。而京山农村,农民只要能动,就得劳动,否则舆论就会说他们不懂得怜惜子女,自己也觉得愧疚。因为可以心安理得地宣布退休,闽西老年人在老年生活安排上就有很大的自主性和发言权,在代际关系中处于相对较好的位置,他们完全可以不必走自杀这一条路。

闽西农村老年人自杀少,还与他们对自杀的恐惧有关。吕德文说,闽西客家农村,农民认为,自杀的人在死后会变成厉鬼,

厉鬼一幅恐怖的面孔，整天想着报复仇人。做厉鬼显然不如做家神好。同时，张牙舞爪的厉鬼使死者具有惩罚相关他人的能力，从而引起相关他人的恐惧。闽西农村关于含怨和含恨自杀者的死后想象，不仅给自杀者设置了界限，而且为可能自杀者提供了以自杀变成厉鬼来复仇的想象，并因此使相关他人在做事情时不要太绝。

与闽西相似，江西吉安农村，老年人最关心的一件事情是死后能否进入祠堂。江西宗族型村庄，老年人死后，要在祠堂办丧事，不能在祠堂办丧事，不能算是善终，而死在村外的人是不能到祠堂办丧事的。罗兴佐是江西吉安人，据他讲，江西人民医院院长是他的同村人，院长母亲90多岁，住在南昌，一旦感到身体不适，就坚决要求回到家乡，以可以死后在祠堂办丧事，及死后进入家神榜。江西宗族地区老年人很少会主动谈论死亡，除非实在无奈（比如病痛），而不会贸然尝试自杀。而京山农村，老年人认为死亡是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对死亡持一种唯物的，甚至无所谓的态度。

在北方农村，比如河南、山东、陕西农村，老年人自杀会造成极其严重的问题，尤其是其子女的声名一定会被弄得一团糟。正是这样一种自杀成为事件的结构力量，可以防止老年人自杀，老年人即使真的想要自杀，他也不得不顾忌自杀会给子女留下什么样的坏形象。同时，一旦子女不孝，老年人有可能通过自杀来报复子女。有老年人担心达不到报复的效果，而会将自杀搞得十分的惨烈，唯恐人们不知道他的子女不孝。

杨华调查的湘南农村，老年人自杀的情况与北方农村具有相同的轰轰烈烈的效果。只是湘南老年人自杀率要远高于北方农村。

四川是一个老年人自杀率很低的地区，我们在四川绵竹5个村调查，很少听到老年人自杀的。王玲是四川人，她说，四川老年人都很怕死，对死亡十分恐惧，不到万不得已，老人们赖活着也会活着。

还有一些地区，比如郭于华所调查过的河北农村，老年人因为子女不孝，而活不下去自杀的情况，似乎比较普遍。老年人活不下去而自杀的情况也有两种，一种是带着对子女的强烈怨恨情绪，因为他对子女具有很强的期待。他可能选择自杀，但我死也不能让你们好活，他要报复子女，他可能选择战斗，诉诸村庄

的舆论,甚至法律,搞臭子女。还有一种情况则是带着无奈,带着失望而自杀,他们悄悄地离开这个世界。

## 六

显然,自杀与老年人的处境有关,与村庄结构性力量有关,与鬼神信仰有关,与对死亡的态度有关,与地域主导舆论、意识形态等观念有关(父母应该像父母,老人应该像老人之类),与利己利他的考虑有关,还与代际关系及对代际关系的期待有关。

京山县农村的代际期待,正由不平衡的代际关系向平衡的代际关系演变。目前的老一辈对子女付出多,而期待的回报少,或他们得不到期待的回报。他们对于子女不孝,多采取沉默、认命,当然也是悲伤、无奈的态度,他们认为自己已经老了,大半截身子已经埋在土里了,自杀不过是“顺条道”,而子女还有几十年人生要过。

在代际期待高的地方,即使父母没有为子女作大贡献,父母也认为子女应该对父母好,毕竟父母生养了你。子女不孝就容易引起父母的激烈情绪,这种情绪不是悲伤,而是悲愤、愤恨,他们在该出手时就出手,无论是诉诸舆论还是法律或其他结构性力量。河南农村,老年人自杀率远低于京山农村,但因为代际紧张后发生代际冲突的比例及冲突烈度都是相当高的。同时,河南农村中出现子女至孝的比例也相当高,正是因为存在代际关系的高度期待,而容易发生剧烈的代际冲突及容易出现代际关系的感人孝事这种相反相承的现象。

京山农村,因为代际期待少,至孝是极少见的,代际关系的剧烈冲突也是极少见的,甚至老年人用惨烈方式自杀的情况也是极少见的。因此可以理解“老年人死了还不如一条狗”。

## 七

中华民族是缺乏抽象信仰的民族,构成中国人民生活意义的基础力量来自具体的家庭生活。在中国人的家庭生活中,代际关系显然并非只是“养儿防老”,“养儿防老”背后,构成农民人生意义的是“传宗接代”,“传宗接代”就使个人有限的生命被赋予到了无限的子子孙孙延续的事业之中。传宗接代构成了中国

农民的宗教,构成了他们生命意义的核心部分,这也是为什么“断子绝孙”是最为恶毒骂名的原因。

但是,如果传宗接代的“宗教”缺少了“养儿防老”的支持,若子女不孝,且老年人自杀变得普遍,则传宗接代的事业也就断不可持续,生儿育女就变得缺少意义。在京山农村,与老年人自杀率居高不下相一致,农村年轻人生育意愿极低,即使头胎生女孩,政策允许生育二胎,绝大多数年轻夫妇也选择只生一胎。现在的年轻人不关心有无儿子,而关心自己是否活得舒服。

一是人们只关心自己生活得舒服与否,一是不再对未来寄以期待。一旦不再追求子孙延续的无限事业,人们就会失去对生命意义的基本拷问,就会变得暴戾,社会的基本秩序就会成为问题。

千百年来,家庭构成了中国人的宗教,尤其是在农村,家庭几乎构成了农民生活意义的全部。在现代性的冲击下,在农民大规模流动的背景下,中国农村家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京山农村以老年人高自杀率为表现的家庭意义的瓦解,是一个重要的讯号,重建中国农村的家庭价值,实在是一件无比紧迫的事情。

2008年11月16日晚

# 从婆媳关系变化看社会 和家庭结构的变迁

杨 华\*

在京山农村调查时,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现在都是妇女当家”,年轻媳妇在家庭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虐待妇女的现象几乎绝迹。婆婆则越来越难当,要极力地讨好媳妇才能维持家庭的平静,与以前婆婆的形象相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农村婆媳关系的变化是农村社会变迁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考察农村社会结构和家庭结构变化及其动力的重要线索。

## 一、尊贵的婆婆与解放前的婆媳关系

在京山农村,就家庭结构和社会关系而言,解放后的土改是很重要的历史分界线,前后两个时期的婆媳关系有着质的区别。

解放前的家庭中,无论富贵贫穷,婆婆较媳妇而言是“尊贵”的,媳妇是下等人,低人一等,“接个媳妇不能对她好是真的”,这个尊卑长幼之分的秩序,不仅有儒家伦理的支撑,而且有宗族小传统和结构性力量的支持。媳妇在婆婆面前是“小媳妇”,受婆婆的使唤和屈辱,几乎很少有对媳妇好的婆子。媳妇每天一大早第一个起来,要收拾好家务,到厨房烧茶做饭,然后端茶到婆婆房间里给老人家“请安”。“请安”是极具象征性的,是婆婆地

\* 杨华,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人员。